



总主编 张鸿仁  
阳泉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

# 红二十四军始末

陈霁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 目 录

|                  |    |
|------------------|----|
| 革命风暴席卷华夏 .....   | 1  |
| 巍巍太行响惊雷 .....    | 10 |
| 中国北方的第一面红旗 ..... | 25 |
| 浩气长存 光照千秋 .....  | 35 |

# 红二十四军始末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 10 周年的日子里,1931 年 7 月,在太行山麓一个普通而古老的山城——山西省平定县城,发生了一起震惊华北以至全国的历史事件——中国北方的第一支工农红军诞生了,之后不久,中国北方的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也相继诞生。人民群众兴高采烈,阶级敌人胆战心惊。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虽然这支红军队伍的历程很短暂,然而却很辉煌,它如同一颗不灭的红星,一直在闪闪发光。也许因为它短暂,所以在历史的档案中,缺乏较详细的记载;也许因为它发生在 20 世纪的初叶,所以许多人对它又较陌生。为了不忘记过去,为了永远的纪念,让我们重新翻开这页光辉的历史,向亲爱的读者展现……

## 革命风暴席卷华夏

1921 年 7 月 1 日,在沉重黑暗的华夏大地,似火山突爆,顿时迸发出耀眼的光芒——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她像茫茫大海中的灯塔,为中国人民指明了革命斗争的

方向,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

1924年至1927年,在中华大地上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第一次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人民大革命。1924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与孙中山达成协议,形成了第一次国(民党)共(产党)合作。这场大革命以国民革命为口号,以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为旗帜,其斗争声势之浩大,发动群众之广泛,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926年7月发动了著名的北伐战争,革命军所向披靡,革命势力从广东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中部地区,统一了半个中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掀起了全国范围的革命高潮。然而,就在此时,隐藏在革命阵营里,却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利益的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蒋介石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公然叛变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镇压工、农、学生运动,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在南方各省以至全国各地,霎时间风云突变,白色恐怖笼罩全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敌人的镇压所吓倒,而是以更大的义愤,掀起了猛烈的反抗浪潮。中国共产党人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认清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就是武装斗争,党必须掌握革命武装,没有革命的武装也就不可能实现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立即展开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

在党的领导下,1927年8月1日举行了南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造人民革命军队的新时期。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并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当年9月,由毛泽东同志组织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起义部队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中心——茨坪,从而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紧接着,在党的领导下,各地组织发动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如广州起义、广东的海陆丰起义和琼崖起义、湖北的黄安和麻城起义、洪湖起义和湖南桑植的起义、陕西的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江西的东固起义和弋阳、横峰起义,以及湘南起义、闽西起义和闽北崇安起义、河南的确山起义、江苏的泰兴和南通起义、湖南的平江起义、广西的百色和龙州起义、四川的万源和宣汉起义等等。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全国13个省13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接连爆发了100多次的武装起义。随着这些起义的爆发,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以烽火燎原之势在全国各地熊熊地燃烧了起来。从而开创了在农村

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和扩大人民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在百余次的武装起义中，有的起义成功了，有的遭到失败，但随着这些相继的起义，组成了各路红军武装。中国工农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了起来，到1930年初，红军主力部队已发展到7万多人，地方武装发展到近3万人。而且相继建立了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闽浙赣、右江、琼崖等革命根据地，在10余省的300多个县，建立了大小不同的共10多块革命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对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壮大恐惧万分，蒋介石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拉拢各派系军阀，共同加紧对革命根据地的进攻，集中重兵对红军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江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打破了敌人多次“围剿”，取得了节节胜利，但是，也有的地区因形势不利或敌我力量悬殊，或者因指挥不当，造成了局部根据地暂时缩小或者失败。总的说来，全国的革命根据地是发展了扩大了，中国工农红军也逐步发展壮大着。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在进一步激化。国民党新军阀一方面勾结和投降帝国主义，共同进攻红军，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残酷镇压革命群众，加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另一方面，各派系间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集团的利益，他们不断进行明争暗斗，企图消灭异己，扩张实力，争夺地盘，相互攻打，从而造成军阀混战时起时伏的局面。1929年3月发生了蒋（介石）、桂（李宗仁、白崇

禧)战争;10月又发生了蒋对桂、张(发奎)联军的战争;尤其是1930年4月至10月,爆发了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其规模空前,双方投入作战的兵力多达100多万人。这种新军阀的混战,一方面更加深了全国人民群众的苦难,使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严重激化;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军阀的自身力量,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给革命力量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军阀的中原大战,使山西的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原大战中,阎锡山和冯玉祥战败,败军25万人一齐退入山西,全省105个县中,几乎没有一个县无战败的客军驻扎。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被蒋介石逼得下台逃往大连,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改组了山西省政府,并且指使山西省银行肆意滥发纸币,使全省物价飞涨,通货急剧膨胀,金融极度混乱。大批败军猬集,供应浩繁,这些队伍的粮秣及一切所需,都要向驻地勒索摊派。供应偶有不周,便以武力威胁,而且,这些部队奸淫掳掠,殴打百姓更为普遍,给山西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同时,蒋介石还下令对山西驻军进行编遣,缩编裁员,有的部队因不满编遣而产生哗变,山西局势一片混乱。

1930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这次会议对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根据地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和红军,加强党



在白区的工作,组织工人的经济和政治斗争,积极发动农民的各种斗争和国民党军队的哗变,并努力准备武装暴动。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力量,加紧对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为了分散蒋介石的力量,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党中央根据山西各种矛盾的激化情况和党的工作发展状况,决定把山西作为创建北方革命根据地的重点地区,以造成南北呼应的局面。主持会议的瞿秋白和周恩来,还与中共北方局书记贺昌谈话,对山西的革命斗争做了重要指示。同年10月,中共北方局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决定在山西要组织发动革命兵变,尽快组建工农红军,创建苏区,将山西变成江西第二。为了加强对山西工作的领导力量,于年底相继派出了1921年经李大钊介绍入党的、富有党务工作经验的刘天章赴太原,担任中共山西特委书记,派出富有兵运工作经验的谷雄一,担任中共山西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

1931年2月,北方军委秘书薄一波和顺直省委山西巡视员贺昌先后到达太原巡视和指导山西党的工作。贺昌和薄一波在太原接连参加了山西特委召开的几次会议。在一次会议上,谷雄一代表山西特委提出要在高桂滋部举行兵变的计划,贺昌、薄一波代表顺直省委完全同意这一意见,并和与会同志作了研究。

1931年4月,中共山西特委在贺昌同志直接参加并领导下,讨论了山西党的工作任务和方针。在确定的各项具体任务中,很重要的一项即是:加强党在阎锡山、冯



玉祥部队中的工作,加紧对自发兵变的领导,争取转变为工农武装队伍。紧接着又召开了军事工作会议,集中讨论了发动革命兵变的问题。会议分析认为,随着党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之后又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并且两次击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信心,全国范围掀起了革命高潮,尤其以南方更为轰轰烈烈。在北方地区,由于军阀连年混战,人民痛苦不堪,广大群众对反动统治和压迫的痛恨与日俱增。近年来党在工人、农民、士兵中大力开展了革命的秘密活动,群众的觉悟日益提高。在一些国民党的部队中,士兵们深受反动军官的横暴欺压,长期欠饷,生活困苦不堪,这就迫使更多的士兵要求走上革命的道路,士兵们迫切盼望举行武装暴动。在山西驻军中就接连发生多次自发的兵变斗争。这些都为发动武装起义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且,还讨论认为,在山西发动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其意义非常重大,它不仅仅是满足部队中多数士兵的革命要求,而且它可以极大地动摇山西以至华北敌方的军心,可以直接而有力地鼓舞华北人民的革命斗志,也会有力地支援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斗争。会上对山西组织兵变的工作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部署,特别明确决定,首先要在党的基础工作比较牢固,组织武装起义成功把握比较大的高桂滋部队中发动兵变,依托五台山开辟革命根据地。随即,中共山西特委将计划报送党中央后,很快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并明确指示

这支武装起义部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接着，中共山西特委决定派军委书记谷雄一，迅速到高桂滋部队，主持建立党的军事行动委员会，亲自领导并具体组织兵变活动。特委书记刘天章直接主持制定土地革命纲领，起草武装起义的文告，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布告、告农民书、告阳泉驻军和农民、贫民宣言等。由山西省团委书记娄凝先主持制作红二十四军司令部和政治部两面大旗，以及刻制印章等等。谷雄一肩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满怀豪情地迅速投入了战斗。

谷雄一，原名谷文会，曾用名苏亦雄等，1905年4月出生于河北省安国县北各堡村。其父原在药行学徒，后自己经营中药材。谷雄一两岁时其父病逝，家境艰难，靠舅父资助得以上学读书。1921年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在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参加了学校中的进步社团，阅读了多部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以及进步的刊物。他那追求革命真理的精神，很快得到学校共产党秘密组织的重视和关怀。党组织负责人张廷瑞同他建立了革命友谊。1924年秋，中共保定市委成立，张廷瑞为临时代理书记。在张廷瑞等人的影响下，谷雄一积极参加了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成为活跃的骨干分子。1925年夏，谷雄一从育德中学毕业。正值冯玉祥在北方组建国民军，并在张家口办了一个“西北陆军干部学校”。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时任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他为了建立革命军队，有力地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便指示有关党组织要选拔一批精干的政工人员，到冯玉祥部

队开展工作。此时,谷雄一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由于表现出色,也被党派往“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西北军担任下级军官,后被提升为中校参谋。当时,在冯玉祥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担任着领导工作,如刘伯坚、刘志丹、刘天章、张兆丰等。谷雄一和这些共产党人,尤其是和张兆丰关系密切。1926年冬,经张兆丰介绍,谷雄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共产党人被迫离开了国民军。谷雄一只身来到北平。1928年夏,党组织指示他利用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毕业的资历,到商震办的河北军事政治学校工作。商震原是陕西军阀陆建章的旧部,后投靠阎锡山,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他为了扩充实力,便在北平黄寺成立了河北军事政治学校。谷雄一进入军校后,被任命为军校步兵第三中队上尉区队长,很受商震器重。谷雄一为了开展工作,便对当时的180多名军校学员的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经分析表明军校中多数学员都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尤其是从保定二师毕业的学生,曾多次参加过党领导的学潮斗争,他们思想进步,革命热情很高。于是,谷雄一有重点地逐步培养一些骨干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发展了20多名共产党员,并秘密建立了党的基层支部。1929年7月,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党组织安排谷雄一离开军校,专门在北平、天津、唐山一带从事兵运工作。他积极协助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张兆丰,在北平、天津及冀东广大地区,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武装小组,并在各派系军

阀队伍中,以及军事干部学校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我党兵运工作的基点。1930年初,中共北方局决定建立平汉北段兵暴委员会,组织发动唐山兵暴。这次兵暴由张兆丰亲自领导,谷雄一负责制定具体行动方案。原计划于1930年3月4日凌晨举事,以当时驻唐山的晋军李生达部所属二一四团为基础,由唐山工人和丰润中学学生配合,士兵暴动成功后,组建为北方红军第九路军,由谷雄一出任政治委员。但是,因行动前不慎走漏了消息,敌人已采取防范措施,兵暴未能实现。谷雄一身份暴露,被敌悬赏通缉,只得化装逃往天津。在天津执行任务时,被敌人逮捕入狱,后经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出狱,于1930年底,被中共北方局派往山西,任中共山西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继续从事兵运工作。中共山西特委研究决定,派谷雄一亲自深入到驻平定县的国民党高桂滋部队,直接组织领导武装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

### 巍巍太行响惊雷

高桂滋部是军阀中原大战后退至山西省的败军之一,驻扎在平定县。平定县位于山西省中部东侧,太行山西麓。东邻河北省井陘县,西连山西省寿阳县,南接昔阳县,北连盂县。县城距军事、经济重镇阳泉15里。境内群山环绕,沟壑纵横,地势险要。东有长城及著名的天下第九关——娘子关。正太铁路横贯东西,乃山西的东大门,

冀晋之咽喉,故有“晋冀通衢”、“京畿藩屏”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高桂滋部原为陕北起家的一支杂牌军。高桂滋的姐夫郑庠,乃是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军独立骑兵一旅旅长。高桂滋即投靠郑庠属下。1926年冬,郑庠部队与另一军阀马富魁部队发生冲突,被山东军阀张宗昌派兵夹击于河北省河间县。混战中高桂滋率部突围,后到达安徽投靠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高桂滋又投入新军阀蒋介石的怀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七军军长,归方振武指挥。1929年,方振武反蒋被扣南京,高桂滋部又归柏文蔚指挥,并将高部的四十七军缩编为独立第十旅,高桂滋也由军长降为旅长。高桂滋从此对蒋介石怀恨在心。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反蒋,高桂滋又投靠冯玉祥部下,被任命为陆军第二十三军军长,蒋阎冯中原大战,阎锡山和冯玉祥等战败,败军残部二十五万之众纷纷退入山西境内。原在山东省临沂、莒县、诸城一带与蒋军交战的高桂滋部,也由利津、蒲台渡黄河,经惠民、衡水、正定、十八盘被迫退至山西省平定县。不久,获胜一方的蒋介石和张学良将退入山西的军队进行整编,高桂滋部被缩编为陆军新编第十一师归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节制。高桂滋部原来的三个师缩编为三个团,高桂滋也由军长降为师长,其下属军官也随之全部降级。高桂滋部有三个步兵团,还有师直属的宪兵连、机枪连、炮兵连、通讯连、特务连,共约3000人。师部及第一团和直属连队驻扎在平

定县城内，其余二、三团分别驻扎在距县城五、六里远的大营盘内。

高桂滋部退至平定县后，完全处于客军地位，它既不是蒋介石的中央军的嫡系，又不是阎锡山的晋军。这支部队里的军官多是西北地区的人，士兵又多为河南、河北及山东人。因此，处处受排挤，军需供给受刁难，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各级军官因普遍降职降薪，牢骚满腹，怨声极大。士兵们更为困苦，几个月发不了军饷，偶尔发一点还不够买几盒香烟。每个士兵的菜钱每天仅有七、八个铜板，连吃饭都很困难。士兵们换季却换不了服装，穿的是破衣服，鞋袜大张嘴，睡觉没被子，故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山西出的土包子，关饷关的纸票子，阎老西不吃香，破鞋破袜破军装，吃的小米掺着糠。”而且，有些反动军官对士兵更是百般虐待，动辄打骂、体罚，士兵有了病不能站岗，不仅得不到医治，反被骂成懒种败类，士兵们不堪忍受这种牛马生活，便有的单独离队，有的结伙逃跑，可是一旦被抓住，轻者被割掉耳朵，将耳朵挂在院内示众，重者则是被活埋、刀砍或枪毙。仅 1931 年 1 月至 6 月，就有 30 多名逃跑被抓回的士兵遭到活埋、打死。对于这种暗无天日监狱般的生活，士兵们真是忍无可忍，盼望着早日能脱离苦海，越来越倾向于革命。于是，士兵暴动一触即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这支部队里，我党的秘密兵运工作开展得比较早，而且一直未间断，已有相当的基础。由于高桂滋是陕北人，这支部队从陕北起家时招募的也多是陕北人，其

中有不少人原是榆林省立六中、榆林职业中学、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学生，且有不少人已成为中下级军官。这些青年学生在学校时，有不少人就接受了新的进步思想，具有一定的革命热情。于 1925 年 9 月，我党地方组织利用军阀郑庠举办军官学校训练班之机，便派了部分党员打入高桂滋部队。在高部一直负责电讯联络工作的陈子毅就是其中之一。1926 年冬，高桂滋为了扩充势力，在陕西、河南、河北一带又招兵买马，中共豫陕区委利用此机会，又派遣赫光、苗广义、刘明德、窦宗融、蒲子华等 10 多名共产党员，打入高部开展兵运工作。豫陕区委还特别指示赫光，要尽快在高部建立支部组织，赫光备受党组织的重视。

赫光，原名万锡绂，1902 年 2 月生于甘肃省海原县杨郎镇（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杨郎村），父亲是前清秀才，十分重视对赫光的教育。赫光从 8 岁起便被送入私塾读书，聪明好学的他 16 岁考入了平凉陇东公立中学堂。1922 年，中学毕业后，恰逢陇东镇守使张兆尹在青年学生中招募军官，以图扩充势力，他便去应试并被录取，后被派到北洋军阀吴佩孚所办的洛阳讲武堂学习军事。在这个学堂里已有共产党秘密组织的活动，马列主义的著作和一些革命进步的书刊时有秘密传播。赫光读了这些进步书刊，好似心灵上的窗户豁然开朗，使他认识到中国的前途和出路在于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实行社会变革。1924 年，他从讲武学堂毕业，担任吴佩孚部直属机枪连连长，后升任迫击炮营营长。在第



二次直奉军阀战争中，吴佩孚几乎全军覆没。1924年冬，赫光侥幸从战场上脱险，返回家乡。他目睹乡里土匪横行无忌，豪绅为非作歹，经济萧条，民不聊生，使他激愤难耐，立志要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1925年冬，赫光被中共豫陕区委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次年，又被派往高桂滋部开展兵运工作。

自从赫光等10多名共产党员打入高桂滋部后，使这支部队又增加了一批新生力量，带来了许多新鲜的革命空气。由于赫光有着讲武学堂毕业的资历，加之参加过战争的锻炼，所以，高桂滋对赫光很器重，不久就任命赫光为少校参谋，直接参与一些军机事务的处理。赫光利用这个合法的职务作掩护，以整顿为名，淘汰了一些兵痞，选拔了一些具有实战经验的老兵担任骨干，同时还介绍一些思想较进步的青年与共产党员接近，以便对这些青年进行培养。经过赫光等共产党员的出色工作，在一些连队中逐步发展了一些党员，并建立起秘密的党的小组和支部组织。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在高桂滋部队中也开始进行清党。我党组织为了保存力量，决定将一些容易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撤出，留下一些便于隐蔽，有一些掩护条件的同志，继续坚持兵运工作，并指定赫光为高桂滋部中秘密党组织的负责人。留在部队的这些党员根据党的指示，在极其艰难的白色恐怖环境中沉着应变，秘密地进行情报搜集与有关工作，有的党员为防止暴露竟使用英语互相传递信息。不久，赫光与中共皖北特委书记

记魏野畴取得联系,在特委的积极协助下,在这支部队中又发展了一批党员,使党在高桂滋部的力量逐步得到恢复。

1928年4月,魏野畴与赫光共同研究,趁军阀相互争斗,高桂滋部将从安徽阜阳向山东转移,部队军心浮动管理放松之机,决定当部队进入山东省金乡县一带后,发动武装起义。但由于组织不严密,加之准备仓促,起义未能成功,反而造成中共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壮烈牺牲。从这个血的教训中,赫光深刻认识到,要取得武装起义的成功,就必须取得对该部队一定的指挥权和控制权,必须把枪杆子切实掌握在共产党员的手里。为了达到这一点,赫光与一些党员骨干进行研究,一方面要在中、下级军官中,积极而稳妥地物色和培养一些思想比较进步,具有一定革命热情的青年军官,逐步发展成为共产党员,或成为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通过种种上层关系,使一些共产党员能担任营、连、排长的实职,逐步扩大党组织对高桂滋部队的控制权。赫光首先设法辞去了军部参谋的职务,下到团队当了一名营长(高桂滋部退驻山西后,随着整体缩编普降一级,改任连长)。除此之外还通过多种形式和方法,展开思想发动工作,如通过“互济会”、“读书班”等等党的外围组织,吸收进步青年参加活动。有的利用同乡关系“拜把子”等方式,联络感情,借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其阶级觉悟,逐步发展了一些党员。尤其是在中下级军官中,共产党员的数量逐步增加。至1930年,高桂滋部在

平定县驻扎时，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已有五十多名，其中不少人都是中、下级的军官，掌握着一定的兵权。

1930年11月初，中共山西省委（一个月后改为特委）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在山西各地的驻军中开展兵运工作，派李志敏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高桂滋部秘密巡视党的工作，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同时，省委还从高桂滋部队中先后调出拓克宽、吴岱峰等17名共产党员，参加晋西红军游击队的组建工作。

1931年4月，中共山西特委决定并经中央军委批准，发动高桂滋部举行武装起义，创建工农红军，并派军委书记谷雄一亲自领导和具体组织。同时，中共山西特委为了加强骨干力量，还派遣山西军官教导团的秘密党支部书记马芳庭，以及共产党员的军官吴耀礼和牛清明3人，从太原到平定打入高桂滋部。马芳庭通过私人关系打入高部，以给一团副营长刘明德（共产党员）当勤务兵的身份，从事组织联络工作。吴耀礼、牛清明两人，借招募新兵之机，以普通士兵身份进行活动。

而且，为了配合此次武装起义，中共山西特委还派人到距平定县城15里的阳泉矿区，在煤矿和钢铁厂等产业工人集中区进行活动，发动工人开展经济斗争和罢工活动等。中共太原市委还指示党员较多、工作最活跃的南海街党支部，组织数十名失业工人做好准备，一旦武装起义成功，便投奔起义部队参加红军。

谷雄一奉命到达平定后，即刻与赫光等人召开党员骨干会议，传达中共山西特委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决

定,并认真研究了发动武装起义的详细计划,以及工作分工等。大家深入分析了部队的现状,认为和山西特委对该部队的情况估计和看法完全一致,发动起义的条件比较成熟,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尤其是第一团应当成为起义的骨干力量,共产党员的数量比较多,在营、连、排中下级军官中,共产党员占的比例比较大,有的营、连基本上控制在共产党员的手中。而且,第一团驻扎在平定县城内,紧守着高桂滋的师部和地方行政首脑机关,一旦起义枪响,对迅速控制这些敌要害部门比较便利,因此,加强一团的准备工作应成为重点。经过详细的计划,认为需作两种准备:第一种是把高桂滋部的三个团的兵力全部拉出来,组成四个纵队,约3000多人;第二种是把一团全部拉出来,加上二、三团各一部分,约1700人左右,组成两个纵队。要争取第一种设想,确保第二种设想的实现。之后,在谷雄一和赫光的领导下,组成了领导武装起义的军事委员会,以及政治部、宣传队、特务队等组织,分头按计划开展工作。

正当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顺利进行之时,一件预料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1931年6月下旬,由于原在中共中央特科主持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革命,使在上海的共产党秘密组织接连遭到破坏,在高桂滋部潜藏的共产党员、一团二营八连的排长刘玉珊也受到牵连而被捕(刘玉珊是陕北人,在狱中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后被高桂滋下令杀害)。这一突发事件,在部队中引起很大反响,有些士兵情绪

波动,有些已经争取过来的士兵开始摇摆,党的组织已面临被破坏的危险,起义也就难免夭折,形势万分紧急。然而此时,谷雄一正在太原向中共山西特委汇报工作。情急之下,赫光只得立即派共产党员、副营长刘明德借故外出,星夜赶赴太原向中共山西特委请示。特委书记刘天章听了刘明德的情况汇报后,也感到惊愕和忧虑。经过与谷雄一、刘明德一起分析了错综复杂的危险局势后,毅然决定要当机立断尽快发动武装起义。命谷雄一、刘明德急速返回平定,传达此项决定,选择时机立即举事。

1931年7月3日下午,谷雄一从太原返回,在阳泉火车站一下车就赶赴平定,在平定县城东的一个破窑洞里,召开了有10多名共产党员骨干参加的紧急会议。谷雄一在会上首先传达中共山西特委关于立即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他说:“山西特委原来并不急于马上发动武装起义,因为不久前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批判了李立三路线的错误,山西特委计划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进一步组织和发动群众方面,以便为大规模地武装起义创造更好的条件。但是,现在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我们必须抢在敌人前面动手,形势所逼不得不提前举事。”然后,让大家讨论如何具体执行特委的决定。大家在讨论中一致同意特委的决定,而且认为第二天(7月4日)是发动起义的最佳时机。因为这天是星期六,高桂滋要带领下属3个团的团长等人,回北平给其父庆贺六十大寿。师、团的主要头目不在,一些下层军官自然就会放

松,他们急着回家与妻儿团聚,这样就形成群龙无首的状况,正是举事的天赐良机。谷雄一、赫光当即决定于7月4日晚举行起义。接着又详细研究了具体的行动方案,并分工进行准备。

7月4日,天阴沉沉的,雨断断续续地下着,一会儿滂沱大雨往下浇,一会儿是淅淅沥沥往下滴,大一阵子,小一阵子,停一阵子。这种天气令人心中烦躁,也给起义行动带来诸多不便,但是,却动摇不了革命战士火热的决心。天黑后,党员骨干又集中在一起开会,具体检查起义行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完成情况,进而部署当晚行动的作战方略。赫光宣布当晚12时为武装起义的时间,以鸣枪为号,领导这场战斗的负责人为谷雄一、赫光、刘明德3人。具体任务是:第一团攻占高桂滋的师司令部,砸开监狱解救被关押的同志,封锁反动军官的住所,破坏交通及通讯联络,严密监视正太护路军孙楚和李生达部队的动向。在战斗中如被顽固抵抗的敌人包围,部队可从城墙东南角通向城外的暗道撤出(此暗道在两天前才挖好备用);第二、三两团驻地距县城较远,起义部队担任破坏兵营及攻打阳泉火车站的任务。起义成功后,整个起义部队向北挺进,准备在五台山一带开辟革命根据地。

然而,就在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庄严时刻到来的时候,高桂滋师部手枪连的一个班长(共产党员),在“兴盛魁”饭铺喝酒,因酒醉泄密,被敌人觉察。谷雄一、赫光、刘明德等人闻讯后,立即商量应急措施,

果断决定提前半小时，即午夜 11 时 30 分开始行动，使敌人措手不及，随之立即通知有关同志。

就在即将开始行动的时刻，敌一团二营营长刘孔彰察觉营中情况异常，也顿时产生了怀疑，遂派勤务兵通知时任七连连长的窦宗融和八连连长的王子周，立即前往司令部开会。窦宗融和王子周均为共产党员而且是骨干，他俩立即碰头商量，认为去后凶多吉少，必须设法拖延，于是先把传令的勤务兵软禁起来。转瞬之间，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来到了，1931 年 7 月 4 日午夜 11 时 30 分，在太行山上这座古老的山城中，中国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打响了。他们立即带领部队投入战斗，首先派一个排兵力，攻打营部捉拿营长刘孔彰。在营部门口碰上五连连长（系高桂滋的表弟）带人负隅顽抗，立即将其击毙。刘孔彰听到枪声后抱头鼠窜，迅速从后门逃跑。这时，平定城内枪声大作，潜藏在通讯排的共产党员陈子毅，在切断了敌司令部指挥系统的通讯网络后，又派人到县城的电话局进行破坏，使平定城的所有通讯网络陷于瘫痪。这时，起义部队已占领了县政府，打开了监狱，释放了全部囚犯，其中有的人马上就参加了起义部队的战斗。在战斗中有个别反动军官企图顽抗，都被当场击毙。起义部队冒雨兵分三路攻打高桂滋的司令部。由于敌司令部位于平定县的上城，而且敌人已有准备，师直属的手枪队和宪兵连火力密布，居高临下进行阻击，起义部队几次冲锋都未能奏效。当时，在正太铁路附近，还驻扎着正太护路军孙楚、李生达的晋军部队。



谷雄一、赫光等怕拖延过久,会引起孙楚、李生达部的察觉而派兵增援,所以只好改变原计划,顾不上接应远在城外数里的第二团和第三团,起义军的宣传队在平定县城的大街小巷张贴了起义军的文告和一批标语和传单后,趁夜迅速撤出平定县城。从起义枪响至结束战斗仅半个多小时的时间。第二团和三团的同志因未能及时得到提前起义的通知,所以,虽听到城内枪声大作,但由于情况不明,也不敢贸然行动。何况兵营的营门已由军官站岗,严密封锁,因此大队人马难以拉出,只有军官中的少数党员骨干,借了解情况为名,通过多种方法闯出营门,急速追赶起义部队。参加武装起义的有原一团的八个连,以及第二、三团和师直属连队的部分人员,共计1200余人。这次武装起义的战斗虽然短暂,但由于准备充分,井然有序,兵强将勇伤亡极少。起义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群众的拥护。当起义部队从城中撤出向北转移时,在县城西关王公坡



居住的光侗叔侄二人,还主动热情的为部队做向导。平定县

著名的民间艺人郝富根,事后编了一段评说如实反映了当时的情景:“二十三军(指高桂滋部在入晋前的旧番号)驻平定,睡到半夜变了心。各街道,乱哄哄,枪弹响了一点钟。劫了狱,跑了人,吓坏了县长李肇林(指当时平定县长)。手枪队,在上城,攻的快,把得紧,差点摧了榆

林门。走西门,出东门,嘟嘟嗒嗒真威风。沿街走,纪律明,没有遭害买卖人。”

起义部队连夜撤出平定县城后,即跨过正太铁路向北挺进。雨滴滴答答的还没有停,尽管道路泥泞,漆黑一片,然而每个指战员心中似乎都有一盆火,眼前都有一盏灯,个个精神抖擞,情绪高昂。途经白羊墅、韩庄、河底、牵牛镇等村镇,于7月5日清晨进入孟县境。这时,天空渐渐亮了,在东方现出一片薄薄的玫瑰色朝霞,它像火花似的向四边奔放着。起义大军来到孟县清城村外一片宽阔的场地,开始进行整编。谷雄一、赫光分别擎起缀有镰刀斧头的两面鲜红的大旗,上面写着醒目的大字: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司令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军队。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山西特委庄严宣布:经过党中央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今天正式成立了。接着他又宣布了上级的任命:赫光为军长,谷雄一为政治委员,窦宗融为副军长,刘明德为参谋长,刘子祥为政治部主任,杨继雄为政治部副主任。军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队长靳树生,参谋长王子周;第二纵队队长顾昌华(另一说为穆春芳),参谋长蒲子华。

接着,军长赫光以严肃而宏亮的声音宣布部队的纪律,他说:“从现在起,我们已经是工农红军了,就要坚决执行红军的纪律和政策。我们是劳苦大众的部队,

是人民的子弟兵,就要爱护老百姓,无论是行军还是宿营,都不能扰害百姓,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对店铺和商品绝不能损害,要公买公卖,更不能奸淫妇女。违反纪律者,无论是官还是兵,一律以军法论处,官兵一律平等,相互间都是革命同志,要一视同仁。”接着他又说,“我们现在行军前进的方向是继续向北走,要直逼五台山,争取在那里开辟革命根据地。现在在我们的后面是正太铁路,驻有正太护路军孙楚和李生达部队,东面是娘子关,西面是太原,都有重兵把守,我们只能向北面的山区运动。如果遇到阻击的敌人或者后边的追兵,我们都要勇猛冲杀,但不要恋战,要夺路向着既定的路线奋勇前进。一路上还要搞好宣传工作,要充分展示我们红军的革命气概和英雄的风采,扩大革命的影响。”

接着,每个脖子上都围有红巾的红军战士,在两面鲜红大旗的引导下,排着整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踏上了新的征程。就在此时,中共山西特委向全国发出通电,宣告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点燃了北方武装斗争的烈火。这不仅震惊了平定,震惊了阳泉,也震惊了三晋大地,以至整个北方地区。中共太原市委立即向党员传达了这一喜讯,而且散发了许多宣传材料,当时一个油印传单上就写着:“莫打鼓,莫打锣,听我唱个兵变歌。兵变歌为谁作,为的士兵受苦多……。”

红二十四军长驱直进,于7月8日到达盂县上社镇,遇到地方武装的阻击,经过激战,敌人被全部歼灭,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一台收发报机。与盂县相邻的

五台县的敌人，闻讯后十分恐慌，县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并派出保安队与警察前往阻击，命令各村保安团严守以待。7月11日，红二十四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抵达五台县柏兰镇，刚一交战，敌守军就被红军的磅礴气势吓破了胆，顿时仓皇四散，除个别顽固分子被当场击毙外，绝大部分都举枪投降。红二十四军坚持优待俘虏的政策，被俘的士兵愿留者，就地编入连队改造成为红军战士，愿走者马上释放回家为民。

红二十四军这几日鞍不离马，甲不离身地向北挺进，虽后有追兵，前有阻敌，非常艰辛，但士气高昂，连战连捷。官兵同吃同住同战斗，干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谷雄一、赫光等领导同志有马不骑，将马匹让出来用以驮伤病员和粮食物资。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互相关心，互敬互爱，情同手足。这与原来高桂滋旧军队相比，自然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红二十四军原计划在五台山一带创建革命根据地，但经过侦察，敌人在这一带加强了步防，有重兵驻扎，如果要强攻硬拼，就难免造成重大伤亡。于是，谷雄一和赫光等研究决定，暂时改变原计划，带领部队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晋冀两省交界的阜平县发展，等时机成熟后再谋五台地区。部队在此地未多停留，而是从柏兰镇折往东南方向迂回盂县，翻越十八盘大山，于7月13日进入河北省平山县蛟潭庄、柳木园、洪子店一带。7月16日，部队进入河北省灵寿县境，经汉山、陈庄、南营等地，沿路没有遇到敌人的抵抗。这是因为一方面敌人对我军

的实力和动向等情况不甚明了,另一方面都为保存各自的实力,而不敢与我军对抗,所以,我军比较顺利地向阜平县挺进。

## 中国北方的第一面红旗

阜平县位于太行山东麓,与山西省五台县紧邻。全境群山连绵,山陡沟深,山地占境内面积的 75%,境内最高山峰为歪头山,海拔 2286 米,绵亘县境南北。东西横贯一条大沙河,将县境分为南北两大块,县城位于大沙河北岸,大脉山的脚下。阜平是从河北平原进入山西的交通要道,可直逼北平(京)、天津、保定、石家庄,以及太原、大同等战略要地。由于土地贫瘠,交通闭塞,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加之自然灾害频繁,军阀连年混战,地主豪绅又残酷掠夺,阜平县的广大人民群众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到痛苦的煎熬。县城内住有 500 多户人家,地主、豪绅、官吏以及商户多集中于此。阜平县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较早的地区之一,1926 年就建立了城关、城南庄党的支部组织,在一些村庄开展了农民运动,陆续成立农民协会等组织,因而有着较好的群众基础。

当红二十四军大队人马向阜平县城逼近的时候,城内已经乱成一团。县保安团、巡警队慌忙集结队伍,检修枪械,做抵抗红二十四军的准备。一些地主、豪绅和官吏们则惊慌失措地往山里运财物藏东西,甚至全家老小一齐往城外逃,一些穷苦百姓和商户,也慌张失措。当时群

众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是红军，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认为军队和土匪也差不多，无非是杀人放火，抢劫奸淫，无恶不作。因此，听说有大兵快到了，自然也显得惊慌害怕，有的人也跑到城外的山沟里暂时躲藏起来，看看究竟再说。

7月17日，红二十四军进入阜平境。阜平县县长企图负隅顽抗，命令保安团300多人到城南白石岭阻击红军。红军一方面向敌军正面进攻，另一方面分两路迂回包抄敌人。红军战士奋武扬威，个个如出林乳虎，一边高喊着：我们是工农红军，你们快投降吧！一边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发起冲锋。敌保安团这支从未打过仗的懒散队伍，哪里经得住红二十四军的打击，顿时个个都吓得魂飞魄散，丢盔弃甲，抱头鼠窜。敌县长和下属官员也纷纷弃城而逃。第二天，部队到达阜平县城，在城南关的沙河滩上举行了入城的动员大会。红二十四军的军政领导分别做了动员讲话，他们要求部队进城后严格执行纪律，要公买公卖，绝不允许扰害百姓，要按照革命纲领发动群众开展斗争。然后，部队在县城内外分头驻扎，一纵队驻县城附近，二纵队驻东、西庄一带。

在红二十四军向阜平进军的同时，中共保定特委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已派人先期到达阜平县，会同当地党的基层组织一齐前来迎接红军部队。红二十四军的领导同志与地方党组织的同志会面后，相互介绍了有关情况，并研究了近期的工作计划。中共中央曾对工农红军的基本任务做出过明确的指示，即是：第一，发动群众

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第二,开展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自身组织;第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他们研究认为,当前红二十四军的任务应当是:在随时准备迎接作战的同时,部队的中心工作,要放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准备建立苏维埃政权方面。

红二十四军进入县城后,马上就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盖有红军鲜红印章的安民告示,以及红红绿绿的标语、传单贴满了大街小巷。红军战士不仅不抢不夺群众财物,而且还帮助群众挑水砍柴,清扫街道院落。人们看到个个脖子上都围着一条红巾的战士,态度和蔼可亲,见人先笑,大娘大伯的叫声不离口。城里的男女老少都用既感动又诧异的眼光望着这一切,心里在纳闷:这也是军队吗?这是什么军队从来没听说过?他们和国民党的“白军”,和一年来一次的土匪“黑军”,怎么完全不一样呢?再加上他们看到那些地主恶霸和官吏,一听说这支部队要来,便吓得屁滚尿流逃之夭夭,足见这个队伍既不同于“白军”也不像“黑军”。人们开始由害怕到怀疑,进而逐步敢于接近,以至帮助。有一些老年人主动组织起来,帮助部队做饭、安排住房等等。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原来因害怕而躲藏的群众很快都回来了,街面上的店铺也敢开门了,集市也逐步恢复了。

阜平县连年遭灾,加上地主、兵匪的掠夺,老百姓家中几乎没有什么多余的粮食,此时又恰逢青黄不接之时,有不少人家已经断炊。于是,红二十四军便把开仓放



粮济贫当成当务之急。进城第三天便召开群众大会,宣布要开仓放粮。在大会上,人们只见一个个头不算高,浓眉毛大眼睛、很精干的年轻军官,正站在土台子上讲话。下边黑压压的一片人,都瞪着好奇的眼睛,静悄悄地听着。这是红二十四军政委谷雄一在讲话,他说:“乡亲们,今天要给大家分的粮食,你们知道这是谁的吗?这些粮食既不是国民党的,也不是地主官僚的,本来就是咱们劳苦大众种田人的,是咱们穷人用血汗换来的。多少年来,反动军阀、地主老财骑在我们的头上,压迫我们、剥削我们,咱们穷人风吹日晒,千辛万苦种粮食,到头来却吃不饱穿不暖,打下的粮都被他们不劳而获霸占了。今天就要把他们霸占的这些粮食归还给咱们穷苦百姓,这叫物归原主。我们是工农红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也是我们劳动人民的子弟兵。我们要打倒那些地主恶霸、贪官污吏,为咱们穷人打天下,咱们还要成立自己的政府,劳苦人民自己起来当家做主,以后还要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咱们种田人,再也不受他们的压迫和剥削了。”站在台下的人们,一开始怀着好奇的心情,直眉瞪眼地听着,可是越听越爱听,好像句句都说到自己的心坎里,这些都是过去他们敢想而不敢说的话。人们听着听着不觉个个舒眉展眼,人人眉开眼笑。有些饱经沧桑的老人,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时,有人竟情不自禁地大声欢呼:咱们穷人的大救星来啦!红军万岁!一时群情激动,万民欢腾。

阜平县的粮食仓库打开了,成百上千的群众井井有

条地领粮,有担的有背的,个个喜笑颜开,三五成群边走边说笑着往家送粮。一些老人们纷纷说这是阜平古往今来最热闹最高兴的一天。当天就有 2000 多人分得了粮食。阜平县有南北两座粮仓,很快这两仓的粮食都分光了,可是四乡的群众听到分粮消息后,仍然扶老携幼陆续来领取。根据群众的强烈要求,接着又把阜平县头号大地主袁葆福的粮仓打开了,尔后又陆续打开了几家地主的粮仓,3 天时间就发放粮食 300 多石。同时还发动群众把赵义生、郑老清等几家大地主所珍藏的贵重物品、衣服等,也分给了穷苦的百姓。大地主袁葆福逃走时,将带不走的一批银元倒在厕所的茅坑内,也被群众捞了出来,百姓们对红军颂声称道。

就在开仓放粮济贫的同时,赫光带队打开了监狱的大铁门,释放出关押在里面的穷苦弟兄。有一个以卖烧饼为生的 18 岁的小伙子叫罗小虎,家住沙河南岸离县城 3 里多的一个小山庄里,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就因为欠下地主的租金还不起,也被县衙关进了监狱。罗小虎每天在城里卖烧饼,耳闻目睹这两天一桩桩一件件大快人心的新鲜事,只觉得以前在梦里想像的,如今真的都变成了现实,这世道真是变了。他琢磨着关在大狱里受罪的老父亲也该放出来了。他每天都要到监狱门外瞭望,恨不得马上砸烂这道“鬼门关”,把父亲救出来。这一天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红军砸开了监狱大门,父亲随着一伙苦大仇深的穷苦弟兄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罗小虎喜出望外,紧跑几步上前搀扶着父亲,望着父亲

蓬头垢面憔悴的面孔，悲喜交加，他满含热泪地说：“爹你受苦了！多亏来了红军，才把你救了出来。”老罗也喜上眉梢，细问起原由。罗小虎便一五一十地把这几天所闻所见眉飞色舞地讲给父亲听。父亲听后激动地拽着小虎说：“你先带我去见见咱们的救命大恩人！”于是父子俩来到大街上，街上已挤满了人，只见一个高个子的军官，正是赫光，他站在一条板凳上，操着宁夏的口音，清晰而宏亮地向群众讲话：“蒋介石和反动军阀，都是代表地主豪绅利益的，他们设的衙门就是阎王殿，监狱就是鬼门关，大牢里关的尽是穷苦百姓。今天我们打烂了这个阎王殿，砸碎了鬼门关，就是要解放受苦的穷兄弟，跟我们一起干革命。要革命就必须有自己的枪杆子，必须有自己的队伍，没有枪杆子是打不垮敌人的。只有用枪杆子打倒了军阀、地主、恶霸，才能实现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人人都有吃有穿的好日子。大家说这样的社会好不好？”台下人异口同声喊好，震得地动山摇。接着他又说：“要革命仅仅靠少数人不行。当年孙中山武昌起义要打倒清政府，全国响应大家一齐干，几千年来的皇帝佬不是就被打倒了吗？今天也一样，要打倒这人吃人的黑暗社会，也必须



靠众人齐心协力。我们红军是干革命的，但光靠我们几百人、几千人不行，必须

动员几万、几十万的人参加部队，只有众人拾柴才能火焰高，才能有力量。我们欢迎青年的兄弟们参加红军，参加我们工农自己的部队。”话音刚落会场就沸腾了。十多名衣着褴褛的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年轻人一拥而上，喊着：我要当红军、我要参军。老罗和小虎嘀咕了一会儿，爷俩也来到赫光面前，老罗激动地说：“我是刚被恩人们从监狱救出来的，只可惜我老了上不了战场，就让我的儿子罗小虎，代表我们全家的心意，参加红军跟着你们一齐干革命吧！”赫光紧紧握住老罗的手，频频点头说：“谢谢大爷！谢谢大爷！”从这天开始阜平很快掀起了青年参加红军的热潮。在人们口中传唱着：“当兵当红军，红军最革命，到处打土豪，事事为穷人；穷人有武装，不怕国民党。……”通过开仓还粮于民，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以及大量的多种形式的宣传工作，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了。红二十四军和中共阜平县委的同志，通过走访贫苦群众，物色骨干，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于是，在7月26日这天，红二十四军和中共阜平县委联合召开了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来自80多个村的群众代表，以及县城的群众共1300多人。其中有农民、工人、教师、市民等等。大会会场就设在以往穷人见了害怕、不敢轻易出入的旧县衙的院子内。这天清晨，太阳刚从东方冉冉升起，整个山城就渐渐热闹了起来，参加大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欢天喜地的朝着县衙大院奔来。整个大院红旗招展，红红绿绿的标语贴满了墙壁，一面缀有镰刀斧头的鲜艳夺目

的大红旗挂在墙上,显得庄严肃穆。大院里人头攒动,欢声笑语,人们比过大年还高兴,比赶大集还热闹。大会正式开始,红二十四军政委谷雄一首先登台讲话。当他庄严地宣布:阜平县人民自己的政权——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今天正式成立的时候,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人们欢喜若狂,有的人竟激动地流下了兴奋的泪水,口中翻来覆去地说:真是翻身啦、翻身啦!接着,大会选举产生了苏维埃县政府的组成人员共七人:主席刘应融、副主席牛清明(另一说法为主席牛清明,副主席刘应融),委员有张远仁、李英兰、王德修、石德义、孔令明。组成的人员中,既有红军的代表,也有当地的共产党员,以及党外群众。从职业上看,有军人、农民、城市贫民和小学教师。大会还庄严宣布,原来旧政府所制定的法规等一律无效。还把没收的土豪劣绅保存的契约文书和账簿等都用绳子串起来示众,当众烧毁。从此,中国北方的第一个红色苏区,第一个由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的政府诞生了。整个山城沸腾了,人们心花怒放,到处洋溢着翻身解放,万民欢庆的景象。群众自动聚集起来,打着锣鼓,扭着秧歌,边跳边唱:“国民党真可恨,不让农民来革命。红军来到俺们县,又打地主又放赈……”、“分了地主田,谁种谁吃粮。实行苏维埃,反对白眼狼(指贪官污吏)。打倒蒋介石,拥护共产党……。”

继苏维埃革命政权成立后,迅速组建起农民赤卫队,在政府里还设立了农民委员会、士兵委员会,以及邮政委员会等机构。为了保卫红色根据地,巩固工农民主

政权，苏维埃阜平县政府在红二十四军的大力帮助下，很快逮捕和处决了一些土豪劣绅。县里有个恶霸大地主叫赵义，人称“二知县”，又叫赵大吹，他家里就设“公堂”，在大门上还挂着打人棒，哪个佃户“得罪”他，捆来就审就打，在县里无人不晓，无人不怕。这次，赵义被苏维埃县政府逮捕（后被镇压），同时还枪决了保安团头子二郎成，这就成为全县的一件大喜事，人心大快。与此同时，还在境内肃清了一部分残余的反革命武装，在五丈湾、王快镇一带消灭了民团，解散了保安队，没收了地主乡绅的武器等。

为了给开展土地革命作准备，红二十四军和苏维埃县政府、各群众团体，还联合组成工作组，深入到部分村庄进行土地调查和阶级状况调查，登记土地、产量，以及人口、牲畜数量等。红二十四军宣传队还在这些村庄里，通过张贴宣传画、漫画以及演出活报剧等多种形式，揭露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罪行。准备下一步就要发动群众分田分地，实现耕者有其田。苏维埃县政府还积极兴办小学，红二十四军政治部派人帮助编写了课本。第一课是：“人，你是人，我是人，人人读书，做好人。”第二课是：“穷和富，为什么多数人穷，少数人富？……”为此有一首民谣在传唱：“穷人上学堂，感谢共产党。边学习，边站岗，准备打老蒋。”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工作，阜平县的广大群众对红二十四军有了真切的认识，深深感到在政治上、经济上确实翻了身，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除积极参

加各项工作外,还掀起了踊跃参加红军的热潮。10 多天里就有 500 多名青年参军。刚入伍的战士,个个衣帽整齐,每人都围着红巾,英姿焕发,给红二十四军增添了一批有生力量。

红二十四军曾将这段工作的情况向中共山西特委送过报告。为了防备敌人的检查,这个报告是采用普通书信方式写的。它巧妙的用一个放假回家的在校学生的口气,



以他回乡所见所闻给学校老师写信的方法,比较具体的汇报了工作情况。首先描写这里的风景,意在说明这里的形势。然后又写在街面上看到群众集会开仓分粮,接着又写看到了县政府的门口换了一个苏维埃政府的牌子等等,用此方法报告他们的工作状况,表示他们正在站稳脚跟要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心。

红二十四军如火如荼的革命活动,苏维埃阜平县政府的出现,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冀晋大地,震惊了整个北方,它像一把利刃插入了敌人的心脏,国民党反动派不寒而栗,惶惶不可终日,在很短的时间内,北平、天津的《益世报》竟连篇累牍地发表消息报导、社论等文章 40 余篇。他们惊呼这是“江西第二”、“北方之朱毛”。天津《益世报》在一篇题为《高部变兵,急应剿灭》的社论中这样写道:“高部兵变,一部首开其端,他部不难步其后尘。



而窜入太行，则其形势较之江西广昌宁都，尤为险要。……太行山脉，蜿蜒千里。北可经蔚县入宣大，横截平绥一线。南可出井陉，掠石邑，斩断平汉要冲。下临则易定可取，远征则平蓟可窥。……假使有共军千人，则不久即能满万。候其羽翼养成，则包围无所施，窜扰不及防。较之江西，有过之无不及也。故吾人于高部变兵之深入冀境认为情势已极为严重。张副司令（指张学良）统兵华北，有维持治安之责，即应迅派大军，相机剿灭，以免贻害于将来。”

### 浩气长存 光照千秋

1930年的中原大战，由于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助蒋讨伐冯、阎部，冯阎军失败，以蒋介石胜利告终。蒋介石为褒奖张学良，委任张学良为国民党陆海空军副司令，坐镇北平。华北一带为张学良的势力范围。阎锡山在中原大战失败后逃往大连。1931年7月，蒋介石集中30万大军向江西苏区进攻，即进行第三次“围剿”。而此时，两广正在倒蒋。军阀石友三以两广委任的名义，率部沿平汉铁路北上向北平进攻。阎锡山在大连和日本人策划，想借机由晋军联合军阀韩复榘、石友三进行倒张学良的战争，日本军则在东北进行背后策应。结果是石友三首先向张学良发难，而晋军却迟迟不动。当时担任山西省政府主席的徐永昌（晋绥军的高级将领），怕晋军离开山西后，而宋哲元部趁机占据山西，所以迟迟未敢出

兵。石友三部很快被张学良分头击溃。石友三部原有四路军，两路人马被张学良生擒，石友三带一路人马退到山东投靠了韩复榘，剩下的一路，即沈克的一个师被挤到平汉铁路以西的河北省曲阳县一带。

此时，与曲阳紧邻的阜平县，自红二十四军进入后，革命大业正在乘风破浪，高歌猛进。红二十四军遵照党中央和山西特委的指示，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并扩大了自身的力量，正准备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逐步扩大革命根据地。处于穷途末路的沈克，正虎视眈眈地窥伺着这一切。沈克原是土匪出身，后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此人一贯狡猾奸诈，诡计多端。他看到石友三垮了，大势已去，已经无路可走，而要保存自己的实力，就只有投靠张学良。张学良提出了一个条件，让他把共产党占据的阜平县夺回来，才能接受他归降。沈克为了赢得张学良的信任，得到重用，就想在消灭红二十四军方面显露一手，以此作为向张学良讨价还价的筹码。可他也清楚，红二十四军绝非等闲之辈，不仅训练有素，兵强将勇，而且得到群众的爱戴和支持，所以，从山西打到河北，攻无不克，所向披靡。如果采取一般的作战方法硬攻，恐不是红军的手，而且伤亡也大，所以必须施展鬼蜮伎俩的毒计方能取胜。于是，沈克首先让其下属每个人在脖子上都围一条绿巾，号称“绿军”，以表示已脱离了国民党的部队类似红军，而且还散布消息声称要向红军投诚，以混淆视听。然后，命令部队偃旗息鼓，秘密行军，悄悄向阜平推进。其一，派其

下属的二十六旅,由旅长赵海清率领便衣队 400 人先行出发,行程百余里到达阜平县城外的五里庄,派 200 名便衣混进县城内,留 200 名便衣在城外接应。其二,派其二十七旅赶至阜平境内,分布于各险要路口及地段,随机策应包剿红军。赵海清率部到达预定地点后,即派副官持书信一封致红二十四军军长赫光。信中说:“敝旅溃逃至此,素闻军长大名,愿投降麾下,以图报效……。”随后,第二十七旅到达预定地点后,旅长赵渤也派副官持信表示向红二十四军投降,佯言沈克师长已逃,敝部已无所依归,现已走投无路,一直向往红军,赞成共产主义等等。

红二十四军的领导见到这两封投诚信后,即刻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虽然不久前党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然而,在全党内还没有真正从思想上、理论上彻底清理这种“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因此,在红二十四军一些领导干部中,也就难免还存在着这些“左”的错误认识。这些同志只看到全国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近年来,各地武装起义风起云涌,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中央苏区的反“围剿”节节胜利,自军阀中原混战以来,敌人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反革命自身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就认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从而开始头脑发热。他们片面夸大形势对革命有利的一面,忽视了革命力量相对还弱小的基本状况,对形势做出了极为错误的判断。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认为沈克部队中一些人要投诚红

军,乃是形势所迫,是必然的结果。沈克的主子石友三在中原大战中已经遍体鳞伤,之后又攻打张学良,结果更是一败涂地,主子如丧家之犬,沈克一伙只能落荒而逃,况且,如今他前有中央军,后有东北军,西边还有商震为首的晋军,已经是四面楚歌,陷入重围。而且,在敌人部队中,广大士兵的革命要求普遍高涨,沈克部也绝无例外。于是判断认为,沈克部队的一些人面临山穷水尽,从而弃暗投明,投奔红军乃是合情合理之举。在讨论中,多数人认为可以接受沈克部的投诚。既然肥肉已送到嘴边,岂有不吃之理,何况红军正急于扩充力量呢。并且还决定要由红二十四军主要领导及苏维埃县政府负责人亲自到场受降,以表示热烈欢迎和我军的诚意。当时虽有少数同志表示不能贸然从事,尚需慎重考虑,尤其反对由主要领导亲自赴敌驻地受降,但这只是少数而已。于是讨论决定后,就仓促命令沈克部分两路向阜平集结,听候改编,而红二十四军却没有在军事上采取必要的防变措施。

1931年8月9日,一大早阜平的天空就蒙上了一层愁云,阴沉沉的黑云压在山顶,蒙蒙细雨飘落着。吃过早饭,红二十四军政委谷雄一、副军长窦宗融、政治部主任刘子祥,以及苏维埃阜平县政府的刘应融、李英兰等人,率领干部和战士20多人,用10多头骡马驮着猪、牛、羊肉,以及面粉、银元等慰问品,前往城东50里的王快镇,到敌驻地接受其投诚并进行改编。谷雄一等人根本没有料到敌人早已设好陷阱。敌军在村口列队,伪装成热烈

欢迎的样子。当谷雄一等人毫无防备地鱼贯进村后，早已埋伏的敌军立即冲出，在谷雄一等人还摸不着头脑的时候，已全部束手就擒。限于当时的通讯条件，在县城里的赫光等人，对此根本无法知晓。

沈克这一计得逞后，就又命令其第二十六旅旅长赵海清率一个营的兵力绕到阜平县城隔河相对的大周村一带，再次派副官前往红二十四军面见赫光军长，诡称部队给养已非常困难，军心涣散，恳请赫军长尽速前往受降，以稳定军心等等。赫光等人又一次轻信了敌人的鬼话，答应于次日前往法华村受降。

第二天，天已放晴。早饭后，赫光即率领政治部副主任杨继雄等 11 名军政干部，带着两口肥猪、数百个馒头，以及数千元的银元前往法华村，准备受降并给投诚的官兵发饷。赵海清亲自出来迎接，并陪同赫光等人步入早已准备好的举行所谓“受降仪式”的会场。会场设在村中一棵需三四人合抱的参天古槐树下。赫光站在大树下环视四周，只见敌军个个荷枪实弹，周围布满岗哨，在房顶上、山坡上都设有敌军守护。顿时，赫光心中一惊，预感情况不妙，这时才察觉已步入虎穴。但是赫光丝毫不动声色，依然安之若素，不慌不忙地登上讲台，气宇轩昂地向“绿军”官兵讲话：“弟兄们！你们要求向红军投诚，愿意参加红军，我代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的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欢迎。从今天起咱们就成为一家人了。我知道在场的弟兄们大多数人都是穷苦人出身，穷人谁家没有一本受苦受难的血泪账，家家都有妻儿老

小,可是听说弟兄们很长时间都没有领到军饷,生活十分困难。所以,今天就先给大家带来军饷,会后就发给大家。从今以后咱们就肩并肩地一齐闹革命,咱们工农子弟兵就是要打倒地主土豪,要分田分地给穷人,要打出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新天地……。”在场的敌军士兵第一次听到如此激动人心,既新鲜又入耳的讲话,赫光的每句话都深深震颤着士兵的心,一个个全神贯注直呆呆地望着赫光。尽管这时赵海清不断地捋胡须,下面依然纹丝不动,谁也不肯动手。原来,事前敌人已约定以赵海清捋胡子为暗号,一齐动手抓捕赫光等人。赵海清一看屡发暗号,下边就是不动,顿时急得脸色大变。机警的赫光一眼看出敌人的阴谋,当即厉声威吓赵海清。丧心病狂的赵海清即刻慌了神,一声吼叫,命令特务连动手,他自己便像一条恶狗似的猛扑上来,拦腰抱住了赫光。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赫光掏枪打伤了赵海清。剽悍的赫光脱身后立即率领战友们突围。这时枪声四起,乱成一片。赫光等人奋不顾身,左冲右突,但因敌众我寡,赫光、杨继雄等 10 人先后中弹壮烈牺牲,仅有 1 人冲出重围,速返回军部报信。

在军部坐镇的红二十四军参谋长刘明德,以及蒲子华、王子周等人,刚刚听到谷雄一等遭敌暗算的消息,现又传来赫光等牺牲的噩耗,都万分震惊和悲痛,当即紧急集中部队誓与敌决一死战,要救出被敌关押的同志,为牺牲的战友报仇雪恨。然而,敌人早已有准备,此时,敌正调动千余步兵和骑兵,分别向红二十四军的一纵

队、二纵队包抄过来。经过一场激战,终因我军力薄弱,加之仓促上阵,只能且战且退,两个纵队在阜平北的史家寨汇合,然后集中兵力突出重围。

沈克的部队进入阜平县城后,逐户砸开大门进行搜查、抓人和抢东西,抓了200多名百姓,关在旧县衙大院里进行审讯拷打。有一小股敌军用枪押着孙国义等4名青年农民,抬着两桶酒,向法华村走去。法华村的百姓们纷纷逃走藏匿,只见大槐树下横躺着几具尸体,有的还瞪着大眼,紧攥着拳头。周围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孙国义从尸体中辨认出了赫光军长,顿时惊呆了。这时,一名敌军官拿来一把切菜刀,命令孙国义将赫军长的人头割下。孙国义眼里噙着泪,手在颤抖着迟迟不动,他怎能忍心对大恩人下此毒手呢?敌军官气极败坏地用枪指着孙国义吼道:“奶奶的,你不砍下他的头,老子就要你的狗头!”正在这时候,两名敌军抬来一口铡刀,残忍地将赫光、杨继雄等人的头颅铡下,然后,令孙国义等人将人头装入酒桶抬走,以便由沈克向上邀功请赏。当晚,法华村的一些群众,冒着生命的危险,偷偷地潜回村,含着无限悲痛的眼泪,将烈士们的遗体安葬在村东北的山脚下。

在王快镇遭敌暗算的谷雄一、窦宗融等人,第二天就被沈克押解至北平陆海空军司令部行营军法处。在监狱中,这些同志虽遭敌人多次审讯、威逼、利诱和拷打,却都大义凛然,从容自若,坚贞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狱中,谷雄一遇到了曾在唐山一起



组织过兵变工作的老战友、老领导，他俩被关在同一个监狱但不同监房中，两人利用放风的机会碰了面，谷雄一愧疚自责地说：“这全是我轻敌造成的，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给党造成了损失。”当月 27 日，在北平西直门外护城河边，谷雄一、窦宗融等人全部慷慨就义。

红二十四军虽然从阜平县突围撤出，但损失很大，尤其是牺牲了谷雄一、赫光等一批主要领导和骨干力量。部队士气低落，军心浮动。刘明德、王子周、蒲子华等研究认为，当务之急首先是要健全领导班子，加强思想工作，克服消极情绪，树立信心，要重整旗鼓，提高部队战斗力。于是，在宿营地进行了短时间的整顿，组成临时军委，通过民主推选，选举刘明德继任红二十四军军长、王子周为副军长、蒲子华为参谋长（入陕前后又改为蒲子华任军长，刘明德任参谋长）。而且，明确了部队的前进方向。在这之前，中共山西特委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向西北发展”的方针，就曾有过当红二十四军在阜平整顿后，再渡过黄河开赴陕北建立根据地的打算。况且红二十四军中多数又是陕西人，对陕西的情况比较熟悉，因此决定部队要向陕西前进，要和陕西的革命力量一起开辟陕北根据地。他们号召全军同志化悲痛为力量，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为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而更坚强地奋战。之后，便将部队整顿的情况，派专人赴太原向中共山西特委进行汇报和请示。部队继续向北挺进，很快进入山西晋北地区。这里自古为北方要塞，历史上就是兵家征战的戎马之场。其东部有闻名全国的北岳恒山和

“华北屋脊”的五台山，与巍巍太行山首尾相接，纵贯南北。中部有恒山余脉横亘东西，山峦连绵，沟壑纵横，地处偏僻，乃是进行游击战的理想战场。红二十四军就利用这复杂而有利的地形，与敌周旋，边战边向西北前进。在进军途中，他们不仅是英勇的战斗队，而且也是一支生气勃勃的宣传队。一路上他们宣传革命、宣传党的政策，广泛播撒革命的火种。途经灵邱县、浑源县，利用声东击西的办法，攻占了应县的小石口，全歼守敌两个连。接着，红二十四军又转战于山阴县、平鲁县、代县、左云县和右玉等县，一直是苦战、进军，不断与追击与阻击的敌人交火，进行了一次次激战，前后就击退追兵 10 余次，致使部队伤亡很大。于 8 月下旬，红二十四军从右玉县的杀虎口拼杀出来，跨沙漠、过草原，到达绥远省的清水河县（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敌人万分恐惧，急忙调遣大军围剿。当时的北平《益世报》于 8 月 24 日发表消息称：“阜平共匪窜入绥边，该部共匪约七百余人，内有变兵四百余人，新加入之二百余人，该部原系有知识有训练有组织者，非如土匪可比……即分别电令驻绥各部队分别堵截，及力防止该共匪窜入陕边，因陕北无正当负责军队，如窜入该地，恐其声势扩大，严令限期剿灭，悬赏三万元。”红二十四军在清水河一带，面对晋军赵承绶部骑兵及傅作义绥军骑兵的追剿，全军指战员临危不惧，舍生忘死，与敌浴血奋战，伤亡惨重。经过左冲右杀的激战，红二十四军又迂回至山西省平鲁、偏关县一带。原计划从兴县的黑峪口或罗峪口渡过黄河到达陕北，后

来经蒲子华与中共陕西府谷县委负责人柴汉生(又名柴浩,系蒲子华在榆林中学的同学)接头研究,又决定在山西省河曲县渡黄河,攻打府谷县,然后在清水沟、木爪堡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四军于9月上旬,从河曲县娘娘滩强渡黄河,从榆树湾一带登陆。当时部队只剩下八百余人。经过长途跋涉,沿途又不断遭敌袭击,加之所到之处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军心有所涣散,因此,决定在人烟稀少的十里长滩(当时属于河曲四区,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准噶尔旗)做短暂休整。然而,部队还未站稳脚跟,傅作义的骑兵就向十里长滩扑了过来。部队撤出十里长滩又遭到陕北军阀井岳秀一个团的阻击。红二十四军英勇奋战,歼敌两个连,打败了敌阻击。当部队进至麻地沟梁龙头时(今府谷县麻镇),又遭到敌自卫队的袭击,同样被红二十四军击溃。部队到达清水沟、木爪堡一带,与当地党的负责人刘天民取得联系,正准备在此建立革命根据地时,不久,井岳秀的两个旅和傅作义的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营又前来围剿。经过激战,红二十四军再次受到重创。随后,红二十四军兵分三路进行分散活动,一路走内蒙,一路沿长城边活动,一路向晋西北活动,由于分散行动,致使敌军的优势兵力围剿未能得逞。红二十四军脱围于陕西与内蒙交界的大昌汉、新庙一带,尔后部队向西南榆林方向转移。在这期间,红二十四军虽然与追击的敌军进行过多次顽强的苦战,敌军也受到损伤,但是自身的伤亡很大。10月中旬,当部队到达陕西与内蒙交界的渡口、窝兔采当一带,又一次遭到

井岳秀部的重重包围。由于敌众我寡,加之长期疲劳作战,未取得必要的修整,且孤立无援,粮食、弹药奇缺,部队的住宿、吃饭都成了问题,导致全军弹尽粮绝。军长蒲子华准备率军突围转移时,在侦察中不幸被捕,敌人对他软硬兼施,妄图使他投降,但蒲子华宁死不屈,决不叛变,最后被敌人杀害,并悬尸于榆林城楼示众。至此,红二十四军兵败将亡,就地瓦解。只有少部分红军指战员逃散后,历经艰险又辗转找到陕北红军,继续投入革命斗争。

当红二十四军从阜平县撤出,横跨晋北地区向陕北进军的情况传到中共山西特委后,特委书记刘天章特别关注,他怕红二十四军有失,一方面立即向中共陕西特委发信求助,一方面决定亲自赴陕北追赶部队。因为刘天章本人就是陕西人,情况较熟,想帮助红二十四军在党的基础工作比较好的神木以南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于是,刘天章便化装成贩牛商人,昼夜兼程,到达陕西省神木南区沙郊镇,当地党组织立即派人与刘天章一起追赶红军。当他们急匆匆地追赶至榆林以北的石板太地区,得知红二十四军不久前就在这一带被打散的确切消息后,又返回神木南区沙郊镇。中共神木南区区委为了总结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特地召开了紧急会议。刘天章也参加了会议。刘天章在会上沉痛地说:“红二十四军的失败,是犯了‘左’倾路线错误造成的。起义建立红军后,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力量,低估了敌人的力量。同时,又没有取得地方党组织有力地 and 很好地配合,致使

军队既无立足之地，又无群众的支持，因而使得我党在敌军内部工作的数年之功，毁于一旦，实在可惜，可痛！”接着他又说：“红二十四军新的领导入陕后，又制定了一条错误的方针，他们认为只要能把榆林城打下，就可以在陕北顺利地建立苏维埃政权。显然这是不切合实际的，从军事上来说，这是孤军深入敌区而又无配合，焉有不败之理。我们应该牢牢记取这个血的教训。”刘天章从陕北返回太原后，不久也不幸被捕，后被敌人杀害。

自 1931 年 7 月，平定武装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四军，至当年 10 月战败溃散，经历不过百天左右。这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乃是短暂的弹指一瞬，然而就在这可贵的转瞬之间，她却给中国人民绘就了一幅宏伟而绚丽的历史画卷，为中国共产党光辉的历史增添了彪炳千秋的豪壮一页。是她继南昌起义之后，首次在华北的原野上，用革命的武装向反革命的武装打响了第一枪，点燃了华北武装斗争的烈火。她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北领导的唯一一次成功的武装起义。也是她在中国北方广袤的大地上，树立起的第一面革命旗帜，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红色政权，成为江西第二，使得在苦难中挣扎的北方地区的劳苦大众，在黑暗的长夜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这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光辉思想的一曲凯歌，是在中国北方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伟大壮举。对于当时的革命斗争和以后几十年的革命进程，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红二十四军在革命的征程中，荆棘载途，山遥路远，

横跨山西、河北、陕西、内蒙 4 省(区),在 19 个县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在他们所到之处都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渐呈燎原。他们与追击和阻击之敌,进行了激烈的搏战。一批批同志血染沙场,数以百计的烈士为国捐躯。在红二十四军中涌现出了多少英烈,后人已难以说清,甚至在史册里还没有把他们的姓名完全记清。但是,历史忘不了他们,人民忘不了他们,他们是祖国社会主义大厦的奠基人,在鲜艳的五星红旗上,也有着他们热血的光焰。碧血丹心染山河,百世不磨照后人。就在这之后的 6 年,即 1937 年抗日战争初期,就在红二十四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创建了华北敌后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937 年 11 月 7 日,在五台县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差不多同时,中共晋察冀省委在阜平诞生。1938 年 1 月,在阜平县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解放区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让红二十四军的军魂永放光芒,她是一面永不褪色的鲜艳红旗,将万世流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二十四军始末 / 陈需著. —太原:三晋出版社,  
2011.12

(阳泉历史文化丛书 / 张鸿仁主编. 第1辑)

ISBN 978-7-5457-0484-6

I. ①红… II. ①陈… III. ①中国工农红军 — 史料  
IV. ①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02686 号

红二十四军始末

---

著 者: 陈 需

责任编辑: 朱慧峰

助理编辑: 曹锦云

---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922268 (发行中心)

0351—4956036 (综合办)

0351—4922203 (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阳泉市正达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

开 本: 850mm × 1168mm 1 / 32

总 印 张: 16.5

字 数: 350 千字

印 数: 1—500 套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484-6

定 价: 78.00 元 (全九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阳泉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

- 红二十四军始末
- 狂飙“怪杰”高长虹
- 百团大战中的阳泉
- “文献名邦”史话
- 英武俊秀娘子关
- 李宾释法探源
- 名邦硕儒张穆
- 武全文与他的《旷观园集》
- 青春才女石评梅

ISBN 978-7-5457-0484-6



定价：78.00元（全九册）